



未名·观点丛书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欧阳哲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未名·观点丛书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欧阳哲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欧阳哲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9
(未名·观点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1019 - 2

I. ①五… II. ①欧… III. ①五四运动 - 研究 IV. ①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0066 号

书 名: 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著作责任者: 欧阳哲生 著

责任编辑: 魏冬峰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1019 - 2/K · 088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信箱: weidf02@sina.com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22.25 印张 344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自序

五四运动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五四运动的主要代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亦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人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情形是与意识形态的强势介入分不开的，新时期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则与思想解放运动的时代大潮紧密相联，这些都是五四运动史研究的重要动力资源。随着具有激进革命倾向的意识形态逐渐解构，随着担当新启蒙角色的思想解放运动逐渐退潮，五四运动史知识谱系的学术建构工作开始展开。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上个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从发掘、整理相关历史文献，到探寻具有拓展意义的个案研究；从参与相关的纪念活动，到筹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逐渐成为活跃在这一领域的积极分子。收集在本书的这些论文即是二十多年来自己在这—研究领域的成果，它们拨开意识形态的迷雾，以原始材料为依据，回到历史现场，力图对五四运动做出符合历史原貌的客观解释。

本书曾由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出版繁体版。现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简体版，增收了《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论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贡献》、《李大钊史学理论著述管窥》和附录《民主在中国的历史命运》、《五四运动与 20 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新发现的胡适秘藏〈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手稿（16 封）》七篇。将这些论文汇编成集，实为对自己在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的工作做阶段性的总结。

有关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文字可谓汗牛充栋，仔细清理一下，内中不少系同一层面的重复研究。正因为如此，确定自己的研究课题和入手之处，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我选择的论题大致可分为两

种类型：一类是前人较少涉及、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论题，如“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等，这些问题提出后，曾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我的某些研究做法甚至作为套式出现在类似的研究领域里；一类是前人虽有研究，但经自己发掘新的文献材料和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为中心”、“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李大钊史学著述管窥”等。因此，虽然这些论文大多是在一些相关的纪念性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但它们并非敷衍了事的应景之作，而是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依据自己独立研究的经验，我以为五四运动史研究虽贵为“显学”，虽已累积了相当成果，但因种种因素的限制，实在还说不上达到成熟或饱和的程度，只要我们本着求真的精神深入探索，这里仍有相当的空间可以拓展。

收入本书的这些论文所标发表出处均为最初的时间，有些论文的文字在收入本集时有所修改或增订，特此说明。杨书澜老师为拙作的出版做了安排，责编魏冬峰为本书的编校提出了细致的意见，在读的博士生潘惠祥、刘慧娟、赖志伟、高谊、刘会文和硕士生陈瑜、刘嘉恒、薛玉、曹祺、陈少卿等参与了本书和《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两书的繁体版和简体版的核校工作，在此对她（他）们的帮助一并致谢。

欧阳哲生 2012 年 7 月 23 日凌晨于海淀蓝旗营

秀威版自序

收集在本书的八篇论文是自己在近二十年间围绕五四运动史的研究成果。其中前五篇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撰成并发表,后三篇是在新世纪的前九年写作或整理成稿,这些论文在收入本集时,又小作了一些文字修订。相对来说,这 20 年是五四运动史研究比较“冷”的年头,我怀着炽热的激情在这块充满争议的领域顽强地耕作。这些论文都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一种胡适所谓“不苟且”的态度写就的。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近三十多年的研究大势可以说是此起彼伏。有些重大事件的研究(如太平天国史)在经历了一阵子热闹、争议之后,似乎正在消沉下去;有些重大事件的研究(如戊戌变法史、辛亥革命史研究)借助周期性的每隔十年一次的纪念活动,仍然高潮迭起,颇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情形与辛亥革命史类似,它在最近三十年间举行了四次大规模的纪念性学术研讨活动,头两次(1979 年、1989 年)的纪念性学术研讨活动,表现了强劲的解放思想、呼吁新启蒙的势头,使五四运动史研究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紧密结合在一起;后两次(1999 年、2009 年)的纪念性学术研讨活动则在学术的广度、深度,在参与研讨的国际性、多学科性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使五四运动史的学术研究层面得以大大拓展。我有幸负责筹备 1999 年、2009 年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五四运动史研究在这段时期的发展有了更为亲切、现场的体验,其中甘苦自知。

新时期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变”:突破“文革”时期那种讲究教条的极“左”思维,解除禁锢,回归文化本身,这是“一变”;戒除 1980 年代“文化热”中的浮躁情绪,讲究学术规范,推崇学术史研究,这是“二变”;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视野中,通过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和交流,通过对中国自

身文化传统的理性反省,对中国人文学术的发展走向有了新的体认和自信,中国人文学术由此在更高层次上开始新的推进,中西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更为紧密地交融,是为“三变”。这是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总结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是“一变”时期的产物,《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和《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可谓“二变”过程中的代表性成果。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成长正是在经历了这“三变”的过程中脱胎换骨,不断前行。我坚信,伴随中国人文学术自我意识的深度觉醒,随之而来的应是巨大创造能量的释放,这可能是在新世纪我们可以期待的一次飞跃。

当初我进入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时,曾心存一个愿望,写作一部类似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甚或像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那样的五四运动史巨著,以反映那个动荡、巨变时期中国的历史全貌。在学术界没有出现这样一部著作前,我以为这仍是一个值得自己追求的学术目标。但愿自己能为此继续努力,希望现在所做的这一切,能为自己未来的工作做一些铺垫。

感谢最初为自己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感谢蔡登山先生为本书所作的出版安排,他的催促使我在紧张的工作中抽空加快这本论文集的合成。这是我在宝岛台湾第一次出版著作,希望借助此书,与海外读者作一次愉悦、畅快的交流。

欧阳哲生 2011 年 8 月 16 日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目 录

自序	(1)
秀威版自序	(1)
壹 《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以 1920 年至 1921 年《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为中心的 探讨	(1)
一、见证《新青年》转折的历史文献：同人来往书信	(3)
二、《新青年》前六卷之编辑、发行	(6)
三、陈独秀赴沪后《新青年》编辑办法之初议	(13)
四、陈独秀南下后与周氏兄弟的密切合作关系	(21)
五、《新青年》从八卷一号开始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所主控	(26)
六、过渡中的矛盾爆发：陈独秀离沪后《新青年》编辑之再议 ..	(32)
七、一个插曲：怀疑胡适与研究系的关系	(41)
八、《新青年》的归宿：成为中共的纯理论机关刊物	(46)
结语	(53)
贰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传统起源	(60)
一、清代朴学与新文化人的治学路径	(61)
二、以“复古解放”为先导的“价值重估”	(69)
三、传统下层文化的兴起	(74)
四、新文化人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中的历史局限	(81)
叁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关系为中心	(86)
一、儒家、儒学、儒教	(87)

二、新文化运动反抗重建儒学意识形态——孔教	(91)
三、对儒家伦理的排拒与吸收	(98)
四、五四新文化人对儒学的学术评估	(103)
五、余论:关于传统与现代性的思考	(108)
肆 蔡元培与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建立	(114)
一、对传统教育的评估	(115)
二、“教育独立”的理念	(119)
三、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128)
四、教育制度转型:一个未完成的话题	(137)
伍 评蔡元培的中西文化观	(141)
一、近代解决中西文化关系各种方案之评估	(141)
二、蔡元培中西文化观的取向	(144)
三、蔡元培:中西文化结合之典范	(155)
陆 论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贡献	(157)
一、《新青年》的办刊定位	(159)
二、反对孔教的健将	(163)
三、力倡文化革命的观念	(166)
四、推崇法国、俄国革命	(170)
结语	(173)
柒 胡适与陈独秀思想之比较研究	(175)
一、胡、陈联手合作的思想基础	(175)
二、胡、陈之间的思想歧异	(182)
三、胡、陈思想的殊途同归	(192)
四、胡、陈思想与时代的关系	(199)
捌 李大钊历史理论著述管窥	(203)
一、未完成的《唯物史观》讲义稿	(204)
二、《史学思想史》系统的复原	(207)
三、《史学要论》之要旨	(212)
四、唯物史观的初步运用	(216)
五、余论:李大钊历史理论成就及其影响	(218)

玖 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

- 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 (222)
- 一、五四话语与五四传统 (222)
- 二、与革命对话:胡适看五四运动 (228)
- 三、从胡适的叙事方式看自由主义的话语特点 (236)

拾 被解释的传统

- 五四话语在现代中国 (242)
- 一、自由主义视野下的五四运动 (244)
-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五四运动 (254)
- 三、文化保守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反省 (262)
- 四、五四传统:民族主义、革命、民主 (268)

附录一 民主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275)**附录二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278)****附录三 五四运动与 20 世纪的中国**

-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80 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
综述 (292)

附录四 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

- 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综述 (306)

附录五 新发现的胡适秘藏《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

- 手稿(16 封) (311)

壹 《新青年》编辑演变之历史考辨

——以 1920 年至 1921 年《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为中心的探讨

《新青年》从 1915 年 9 月 15 日创刊,到 1926 年 7 月 25 日终刊,历时十年十个月零十天。在这十年间,从编辑、作者队伍和思想内容看,它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第一卷至第三卷,是陈独秀“主撰”的体制(1915 年 9 月 15 日至 1917 年 8 月 1 日),作者主要是皖籍学人或陈独秀引为同志的朋友。第二阶段为四、五、六卷(1918 年 1 月 15 日至 1919 年 11 月 1 日),是由同人轮流负责编辑,作者主要为北大教员和学生。第三阶段为七、八、九卷,它是过渡阶段,从第七卷(1919 年 12 月 1 日)重新由陈独秀主编,到第八、九卷(1920 年 9 月 1 日至 1922 年 7 月 1 日)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所主控,《新青年》逐步从同人刊物向党刊过渡,作者则是原来的北大同人和《新青年》上海、广东编辑部同人共存。第四阶段为 1923 年 6 月 15 日复刊以后的《新青年》(季刊),它是中共中央的纯理论机关刊物,作者则主要为中共党内年轻的理论家。^①

① 有关《新青年》的分期可谓众说纷纭,傅斯年将之分为三个时期:“《新青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看,一是自民国四年九月创刊时至民国六年夏,这时候他独力编著的。二是自民国六年夏至九年初,这是他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不过他在这个刊物中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且他除甚短时期以外,永是这个刊物的编辑。三是自民国十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参见傅斯年:《陈独秀案》,载《独立评论》第 24 号,1932 年 10 月 30 日。《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编者认为,《新青年》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 1915 年到 1918 年,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前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第二阶段从五四运动前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它由一个民主主义的刊物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刊物。第三阶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它曾改组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78 年 11 月版,第 36 页。陈万雄认为,《新青年》从创刊到终刊“大抵可分三个时期”,1915 年 9 月第一卷到 1918 年 6 月第四卷是第

四个阶段中的第一、二、四阶段编辑变更时并无波澜,唯在第三阶段《新青年》南北同人内部产生了分歧和争议。《新青年》从一个同人刊物转变为一个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这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个具有重要历史象征意义的事件。它不仅意味着《新青年》杂志本身的办刊宗旨及其内容的重大变化,而且反映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者成为《新青年》的主导者,这也预示着“五四”以后中国新思想的主流选择有可能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新青年》同人内部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书信往来交换他们对编辑办法和办刊方向的意见,反映了他们的思想演变和交谊变化,故这一过程一直是研究者们讨论的对象。^①本章以已公布的书信和“新发现的一组书信”为主要材料,与其他体裁的文献材料(如日记、回忆文字等)相互印证,剔伪取真,力图真实地重现这一历史过程的全貌,对过去一些不够确切或似是而非的提法加以订正。

一个时期,是同人杂志时期;从第五卷至第七卷(1918年7月至1920年5月1日),是北京大学革新派的阵地;1920年9月第八卷以后直至结束是第三个时期,《新青年》“明显成为倡导唯物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刊物”。参见氏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8—19页。叶再生将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创刊到五四运动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与北大结合,《新青年》同人刊物开始形成,“这一阶段是《新青年》历史中最为光辉的一页”。第二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从同人刊物转变到政党的机关刊物”。第三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至九卷六号后停刊(1921年5月到1922年7月),“从以政治为主兼顾哲学文学的刊物逐步过渡到政治理论刊物”。第四阶段是从1923年6月15日复刊到1926年7月25日终刊,作为中共的机关刊物。参见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118、137、140页。陈平原则按编辑地点的变迁将之分为三期:“假如以‘同人杂志’来衡量,在正式出版的九卷五十四期《新青年》中,依其基本面貌,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以主编陈独秀1917年春的北上与1920年春的南下为界标。”“大致而言,在上海编辑的最初两卷,主要从事社会批评,已锋芒毕露,声名远扬。最后两卷着力宣传社会主义,倾向于实际政治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颇有关联。中间五卷在北京编辑,致力于思想改选与文学革命,更能代表北京大学诸同人的趣味与追求。”参见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60页。由于划分的标准不一,对《新青年》的分期(特别是前九卷)的分歧较大,我以为应以编辑(包括人员和办法)、作者变化为划分标准比较适宜。

① 有关《新青年》这一转变过程的探讨,代表性的论著参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上册《新青年》,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11月版,第1—40页。丁守和:《陈独秀和〈新青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一章“《新青年》及其作者”,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5月版,第1—20页。耿云志:《胡适与〈新青年〉》,收入氏著:《胡适新论》,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4—19页。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册,第102—164页。

一、见证《新青年》转折的历史文献：同人来往书信

有关《新青年》从一个同人刊物转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这一历史过程，现已先后公布了三批文献材料：

第一批为1954年2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内收《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一文。这篇文章共收入1920年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的六封信：（1）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1920年12月16日夜）。（2）胡适复陈独秀（未署时间，应为1920年12月30日）。（3）胡适致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张慰慈、周作人、王抚五、高一涵（1920年12月22日）。此信有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李大钊、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的签注意见（1921年1月26日）。（4）鲁迅复胡适（1921年1月3日）。（5）李大钊复胡适（未署时间，估在1921年1月22日以后）。（6）陈独秀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这些信注明原件保存在北京大学。但从这六封信写信、复信的人员来看，均有胡适，我推测很可能系胡适保存。^①因当时胡适私人档案仍存留在北京大学，这些信可能是从胡适私人档案流出或选出。这组材料成为1979年以前人们讨论《新青年》转折时期各位同人态度的主要依据。

第二批为1979年5月北京中华书局“内部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内又增收了七封与《新青年》转折时期相关的信：（1）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顾孟余、陶孟和、陈大齐、沈尹默、张慰慈、王星拱、朱希祖、周作人（1920年4月26日）。（2）陈独秀致胡适（残，1920年8月）。（3）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9月）。（4）陈独秀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星拱（1920年12月上旬）。（5）陶孟和致胡适（1920年12月14日）。（6）胡适致陈独秀（稿，未署时

^① 从北大档案馆保存的这些信的影印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920年12月30日胡适致陈独秀信的后面有胡适留言：“附件（1）九、十二、三十，我给独秀的信。（2）独秀的回信。（3）独秀给孟和的信（抄）。此二件[指（2）（3），引者按]，尚未寄到。胡适。廿七，十二，九。”这段附加的留言说明直到1938年12月9日这些信件仍保留在胡适手中，因此这些信件无疑应为胡适保存。

间,估约1920年12月月底1921年年初)。(7)钱玄同致胡适(残,1921年1月29日)。这七封信中,除第六封信“胡适致陈独秀”系留稿或抄稿外,其他六封的收信人均为胡适或胡适等。这些信来源于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毫无疑问系胡适保存。在“胡适档案”中还保有陈望道致胡适(1921年1月15日)一信,当时没有公布,后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第三批是鲁迅博物馆于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发表了一批与《新青年》有关的信件。1980年鲁迅博物馆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再次公布其收藏的一批书信。这批书信系鲁迅研究室手稿组辑注,以“胡适、刘半农、陈独秀、钱玄同、郑振铎、傅斯年、陈望道、吴虞、孙伏园书信选(1917年9月—1923年8月)”为题发表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版),内有刘半农致钱玄同(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致周作人(1920年1月27日),陈独秀致周作人(1918年12月14日、1920年3月11日、7月9日、8月22日、9月4日、9月28日),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1920年8月13日、1921年2月15日),^①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6日),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陈望道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6日、1921年1月28日、2月11日、2月13日)^②等信与本主题相关。此外,在《钱玄同文集》第6卷《书信》里还收有一封李大钊致钱玄同(1921年1月)。^③

2002年4月6日我前往华盛顿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亚洲学年会时,顺途访问了居住在华盛顿的胡适长子胡祖望先生一家。访谈之余,胡先生出

① 《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刊登的鲁迅博物馆供稿、陆品晶注释的《陈独秀书信》和《读新发表的陈独秀四封书信手稿》两文,刊发了四封信。这四封信:第一至三封陈独秀致周启明(1920年3月11日、8月22日、9月28日),第四封陈独秀致周豫才、周启明(1921年2月15日)。《历史研究》发表此文时,说明这四封信为鲁迅博物馆收藏。

② 这四封信最早刊登于《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发表的《陈望道书信》,编者说明这些书信手稿收藏在鲁迅博物馆。复旦大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陈望道文集》(第1卷)时又收入该文,改题为“关于《新青年》杂志的通信”,并对注释作了删改。

③ 收入刘思源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书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6页。

示了一包他保留的未刊书信,外面有一张旧报纸包裹,报上有胡适用红毛笔题写的“李守常、徐志摩、陈独秀、梁任公遗札”字样,内中书信,除了梁启超、徐志摩致胡适信外,其他信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弥足珍贵。这些信为:(1)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1920年5月7日)。(2)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1日)。(3)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9日)。(4)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25日)。(5)陈独秀致高一涵(1920年7月2日)。(6)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9月5日)。(7)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12月21日)。(8)陈独秀致胡适等(1921年1月9日)。(9)李大钊致胡适。(10)钱玄同致胡适。(11)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2月1日)。(12)周作人致李大钊(1921年2月25日)。(13)周作人致李大钊(1921年2月27日)。(14)陈独秀致胡适(1925年2月5日)。(15)陈独秀致胡适(1925年2月23日)(以下冠以题名“新发现的一组书信”)。^①有意思的是,这些信中有三封信,即陈独秀致高一涵(1920年7月2日)、周作人致李大钊(1921年2月25日、2月27日),无论写信人或收信人均无胡适,本应与胡适无关,然它们却保留在胡适手中,显然是胡适从高一涵、李大钊手中获得。这些信何时由胡适交其长子保管,并带往美国,我们暂不得而知。这批书信经上市拍卖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

从以上我们所知的在中国大陆(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鲁迅博物馆三处)已公布的书信和我“新发现的一组书信”来看,这些书信主要来自于胡适和周氏兄弟。这些书信的收信者或复信者主要亦为胡适和周作人,其中胡适尤多,不难看出胡适在《新青年》转折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20年2月19日陈独秀只身南下后,《新青年》同人分为南北两股,大部分同人仍留在北京,胡适实为他们的“召集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北京同人的书信绝大部分都与胡适有关的原因。胡适素有“历史癖”,收藏这些信件显然是其有心为之。当然,胡适如此重视这批书信,也反映了他本人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特别关注。可以说,由于胡适的“历史癖”存心保留了这

① 另有一信陈独秀致胡适(1933年10月10日)因与本文主题无关,故未纳入讨论,这封书信影印件参见本书“附录五 新发现的胡适秘藏《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手稿”。我在整理这批新发现的书信时,曾蒙耿云志、沈寂、杨天石、陈漱渝诸位先生帮助辨认和指教,在此谨致谢忱。

批书信,后来的历史学者才有可能真正了解《新青年》转折时期各位同人的真实态度及其内部纠葛。研读这些《新青年》同人来往书信,充分挖掘内藏的隐秘信息,对我们真实了解《新青年》的历史转变及其同人的态度确是一件颇有学术价值的事。

二、《新青年》前六卷之编辑、发行

在探讨《新青年》转折时期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新青年》前六卷的编辑情况。《新青年》之编辑,第一卷未具名,但主编或主撰为陈独秀,则无可疑。第二、三卷具名“陈独秀主撰”(并不是人们所常用的“主编”)。作为陈独秀“主撰”或主编的最明显特征是第一至三卷的首篇文章均为陈独秀,这显然是陈独秀突出个人的有意安排。有的论者认为:在章士钊等协助下,新青年开始招股,酝酿合办同人杂志。其根据是1917年1月13日汪孟邹复胡适信。^①至于《新青年》何时成为同人杂志,确切的日子尚难断定。估计在1917年六七月间,最早的社员可能是高一涵等,钱玄同、胡适等加入肯定要在此后。1917年8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刊登的陈独秀复钱玄同信,内有“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一语,证明此时《新青年》社已有社友,而钱玄同当时并不是。^②1917年10月16日刘半农致钱玄同信中提到:“先生试取《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比较参观之,即可得其改变之轨辙。……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押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③这里的四个“台柱”大概就是《新青年》“四大笔”说的由来。

第四卷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个人角色明显“淡化”。据编辑部公告:“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刊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

① 该信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74—275页。

②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册,第110页。

③ 《刘半农致钱玄同》,载《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303页。

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资。”^①这就改变了前三卷由陈独秀主编或主撰的编辑体制。之所以作出这种调整,应与陈独秀入主北大文科,《新青年》作者主要为北大教授,为调动这些名流作者的积极性,将《新青年》作者群凝结成为一个更加坚固的新文化阵营核心有关。

1922年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时,文中提到《新青年》第四卷编辑安排情况:“民国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归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钱玄同、沈尹默、李大钊、刘复、胡适六人轮流编辑。”^②胡适开列的这份名单,离1918年不过五年时间,列入名单诸人当时均在,应无问题。《钱玄同日记》1918年1月2日载:“午后至独秀处,检得《新青年》存稿。因四卷二期归我编辑,本月五日须齐稿,十五日须寄出也。”^③钱氏的记载坐实了胡适的这一说法。只是当时虽为轮流编辑,实际执行时,相互之间仍有配合和协助,如四卷三号原定沈尹默编辑,沈因眼疾请钱玄同、刘半农代编,署名王敬轩(实为钱玄同化名)、记者(半农)的《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即刊于此期。四卷六号“易卜生号”为胡适编辑。有的论者根据鲁迅《忆刘半农君》一文“采取集议制度,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④一语,认为第四卷的编辑,是“采取集议制度”,甚至“鲁迅也应邀参加了会议,在会上第一次认识刚刚加入编辑的李大钊”。^⑤这些说法均不确切,第四卷实已为同人轮流编辑。

第五卷继续采取轮流编辑办法。周作人晚年据其1919年10月5日日记,回忆起由陈独秀主编《新青年》第七卷之前的情况时说:“在这以前,大约是第五、六卷吧,曾议决由几个人轮流担任编辑,记得有陈独秀、适之、守

① 《本志编辑部启事》,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②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二。《胡适文集》第3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55页。这是原来的安排,沈尹默后改由钱玄同、刘半农代。参见沈尹默:《我和北大》,收入《五四运动回忆录》(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66页。

③ 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4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5页。

④ 《忆刘半农君》,收入《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

⑤ 参见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84页。